

皖南事变亲历记

引子

周凌华 周炳炬

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信时强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你们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更懂得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全党即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解奋斗。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百年在艰难中发展,在困境中前进,在危机中求生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不懈努力,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

最近,我们在研究周氏文化中,发现了当年新四军机要员、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周临冰生前写的《皖南事变亲历记》(由周临冰的侄女提供)。文章将人们带入那难以忘怀的艰难岁月。

周临冰,曾用名周杏芬,女,1921年10月11日出生于临海市(原临海县)城关龙须巷周家里。早在青年时代,受其兄周振(1938年中共临海县委书记)的影响,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8年赴皖南参加新四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1月在皖南参加新四军教导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机要和译电工作。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她直接受到叶挺、项英等首长的培养和教育,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她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九死一生,在深山野岭中隐蔽了七天七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经组织营救脱险,成为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皖南事变以后,周临冰同志转到山东工作,曾在盐城一区、浙西区、地方烟台、河南丰县工作,历任机要译电员、市妇联主任、县妇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湖南长沙市区区委书记、中央财政部党委副书记,后到国家工商总局主持中国广告联合公司工作(副局级),直至1982年离休。

离休后,周临冰同志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坚持社会调查,撰写革命回忆录,深入学校宣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和一些老战友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了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为了教育后人,真实还原历史,她在病重前一个月还与老同志共同筹划组织拍摄一部全面反映新四军的电视剧。病重前半个月,她还坚持到安徽泾县参加项英同志铜像揭幕仪式,表现了一个老同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2001年10月,周临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0岁。其生前写的《皖南事变亲历记》,生动形象地记录了皖南事变惊心动魄的历程,实录了当年皖南人民对新四军战士深厚的感情,表达了对深明大义、敢于舍命救人的爱国之士和帮助他们脱险的战友、群众的深切感恩。



施奇烈士纪念雕塑。

周临冰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真是百感交集,万分沉痛,这个血的教训是永远永远不能忘记的。

1941年1月4日晚上,我们惜别了在一起战斗生活了近三年的乡亲,举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踏上了新的征途。最后撤离的一批队伍共九千人,编为三个纵队,军直属机关是单独编队的,我们机要科工作人员有十多人,其中四个女同志。出发不久,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将密码分散埋在就近稻田里,开始使用脑子里记住的密码。

因连日下雨,行军速度缓慢,几天后我们身上的背袋空了。一天,首长叫把一匹腿受伤的马来给大家充饥。刚要开饭,顽军的枪响了,炊事班的同志挑着煮熟的马肉就走。枪声稍停便把马肉一块一块地装到战士们碗里,我们边吃边爬山,顽军从山下追逼上来,当我们爬到山顶时天已黑了。当顽军追到山顶,我们早转移到第二座山。由于多天来没有休息过,我已疲惫不堪,行动困难。一位战士看见我掉了队,便不顾自己劳累,用力把我拉到山顶。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是被顽军乱枪打死,也会被俘虏。可惜我还没有问他的姓名,也来不及向他致谢,他就匆忙地回到战斗队伍去了。

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情况越来越危急。包围反包围,冲散了再集合,集合起来又被冲散。为了突出重围,我们不得不从山顶上冲下来。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密集的枪声。在忽明忽暗的月光下,我看到有的手脸被划破,衣服裤子被撕成了片。后来听老乡说,这个山顶从未有人上去过。翻越东流山到达石井坑,又遭到顽军108师的伏击。双方混战了一夜,我军经七天七夜的苦战,被迫退守石井坑集中。

二

记得在高坦时,叶挺军长曾向教导队和军直属队人员讲话: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我起直到每个战士,就是剩下一个人、一支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军长拿着他的三用文明棍,脖子上挂着望远镜,亲自指挥作战,有时流弹从头顶上穿过,他也若无其事,他的沉着镇定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军长还命令把迫击炮架起来,说:“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甩掉。”我们只有两门炮,当然不可能把敌人打垮,但要让敌人听到我们有炮,要给我们部队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到达石井坑整顿队伍时,顽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叶军长原想把整个部队带出去的打算看来是难以实现了。这时,正好中央来电说:如有可能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叶军长立即下令组织突围。

当天傍晚,领导机要科的童秘书给我们分发银元,发给我十银元,并交代这笔款不到万不得已不得随便动用,没有用完的交公。李一氓秘书长嘱咐我们说:“万一部队再集合不起来,就分散突围,目的地盐城会合;突围不出去就暂时隐蔽在山洞里,待情况好转时,设法到目的地。不要怕饥饿,饿是饿不死的,如果迷失方向,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土地庙,它坐北朝南。”项英副军长流着眼泪说:“早知今日,不如让你们提前从后方这条线转移,现在你们要吃苦头了。”领导这样关心每个同志,使我心里非常难受,只恨自己年轻不懂事,在这紧急时刻不能为领导分忧,还让领导为我们的安危担惊。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冲出去,一定要到达目的地,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希望。

到了晚上,童秘书通知我,机要员要分散到首长身边,担任随身译电员,并分配我跟叶军长行动(主要是考虑冲出包围后及时和中央取得联系)。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跟着叶挺军长。

三

当晚到了西坑,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准备冲出包围,但四处枪声

不断,无法冲出。叶军长沉思了一会儿,命令把部队撤回,停止开枪,让敌人自己相互拼杀。我们抓紧这一时间休息片刻,在老乡家里烧了一只鸡,大家分着吃。

第二天,叶军长率领教导队部分工作人员突围。到大康王时被敌108师挡住去路。军长临时组织手枪队猛烈冲杀,但未能冲出。我军伤亡惨重。军长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答应与108师谈判。我们在阵地上等待军长谈判归来。等着等着,忽然从山上飞来流弹,大家立即卧倒在地上。我醒过来觉得自己没有受伤,爬起来一看,遍地是战友的尸体。我站在那里发呆,抬头看对面山上有几位同志着急地向我招手。我拔起沉重的双腿,踏着战友的血迹向前走,才看清是军参谋处处长陈铁军、作战参谋贾坡、政治部民运部长夏征农和新调来总参的张元寿和他的通讯员,我立即奔向他们。从此,我们六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小分队,一起行动。

我们开始是每走一段路都用柴禾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足迹。后来找到一个地形较好的山洞,我们就隐藏在里面。大家轮流在洞口放哨,察看敌情。开了几天,只听顽军在山脚下高声叫喊:“你们的军长被俘啦,赶快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快下山来给你们发食品,给你们饭吃。”诱骗不成,他们又对山上乱开枪,乱扔手榴弹,进山搜索。我们藏在山洞里不能发出一点响声,就连咳嗽都要先做手势,再用毛毯捂住脑袋,同时也随时准备与敌人拼搏。过了几天,敌人开始陆续向西北方向转移。等到了第五天,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敌人全都开走了。

张元寿和他的通讯员先出山探路,只剩下我们四人。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四人一定要行动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第六天,我们开始在洞外找些野生食物。有一次,陈铁军同志(他曾经过三年游击战考验,是教导队军事教员)好不容易找回一些野菜,还有一颗红色带刺的野果。我们把它分成四份,分而食之。吃空肚子还是饿得难受。每人又将空米袋翻过来,把沾在口袋上的米粒弄下来,数了数,平均每人分到七粒米充饥。第七天,我们口渴得要命,我和贾坡同志下山去找水。山路都是石子,脚踩着石子往下滑的声音太大,只好匍匐前进,忽然发现一片稻田里有水,太好了!我们趴在田边喝了一口泥浆水,真是舒服极了。喝过后,用皮包盛了一包水带上山。艰难地爬回山洞一看,老夏和陈不见了。我很纳闷,还是贾坡有经验,说:“等一会儿他们自己出来的。”原来他们怕发生意外,转移到别处隐蔽了。待他们出来时,我们带回来的水也漏得差不多了,他们俩只好用舌头舔了舔留在皮包上的水迹。

为了早日突围,当晚我们走出了山洞,沿着敌人走的方向往前走。远远看见有灯火,找到了一间,是老乡住的房屋,老乡正在煮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杂烩(锅巴、肉皮、鸡皮混在一起)。老乡看到我们是新四军,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向我们诉苦:“你们看看,这些都是大兵(指国民党兵)糟蹋的,他们一到村里,鸡鸭猪羊粮食一抢光,吃饱了还扔下一地的东西,我们只好拾回来煮着吃。”老夏拿出十银元和老乡商量,分一点饭吃,开始老乡不肯收银元,我们一再坚持他才收下。我们看到这一大锅饭,心想全都能吃下去。谁知一碗还没吃完,眼睛就睁不开了,两腿也发软。老乡一看急忙打扫干净一张床,让我们挤在一起睡。睡前我们交给老乡一块表,请他过一个小时叫醒我们。睡了一会儿我便醒了,睁开眼一看,微弱的光线下,老乡靠着盛稻子的空箩筐,遮住光线,脸上带着微笑正在数银元。到了点钟,他把我们都叫醒,把表和银元如数交给老夏,不管我们怎么说要他留下银元,他死活不肯收,并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好人,新四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你们拿着有用,你们活着出去,我们子孙后代才有出头之日,再说,这东西放在我这里早晚要被国民党兵搜走。”说着他打开后门,指点我们上路。老乡那份真诚朴实的情感,一直牢记在我心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皖南人民对我军的一片深情厚意。

四

我们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往前走,到了大康王口,忽然发现山上下来一个人,他就是在当地铜陵区委工作的陈爱曦同志。有了一位熟悉地形的同志领路,增加了我们突围出去的信心。

有一天下着雪,我们坐在坟地里靠几口棺材掩护,派老陈出去探听路线,一直到晚上才找到老百姓的住处。老乡被顽军吓怕了,夜里敲门不理睬。我们搭人梯翻进院墙向老乡说明了情况。老奶奶告诉我们,国民党军搜查得很紧,老百姓都进山去躲避,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国民党军抓走了。她连续不断地说你们是好,并做了一顿饭给我们吃,又在小桶里找出一点米给我们。

我们离开大康王向茂林方向走,途中遇到顽军又隐蔽了几天,后到茂林附近一幢破房子暂时安顿下来。每天由老陈去打听顽军动向,好决定如何行动。大家经过研究,认为只有扮成客商出去比较妥当,但当时社会上没有女客商,大家想让我装成老夏的女儿,但老夏是江西口音,我是浙江人,经不起敌人盘问。大家冥思苦想,也找不出让我同大家一起走的办法。

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通过老夏的统战关系介绍我到茂林中华圣公会会长陆绍泉家,去茂林路上由老陈与当地群众联系,负责护送。临别时,老夏依依不舍地端详了我一会儿,对我说:“万一遇到敌人,你说你16岁,16岁够不上刑事法律,你懂吗?到了陆会长家,我说我是你叔叔,他会帮助你的。他的女婿吴寿祺和另外一个人吴保尊都是进步老师,也可以请他们帮助你脱险。”最后他又说:“我们不管是



这张照片是1939年冬由叶挺军长摄于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便民桥”。从左开始为董世杰(男),军部机要科科长;接下来为四位女机要员周临冰、施奇(牺牲在上饶集中营),毛薇卿(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后回到部队),汪金球(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电影《上饶集中营》中那位女英雄的原型,就是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施奇。照片上幸存的只有毛薇卿和周临冰。

图片由周临冰侄女周伊明、周伊文提供

谁先到达,都要把我们的情况向党团组织汇报。”

五

当天晚上,我们就分手了,由老乡把我送到山沟里。第二天派贾坡同志来看我,问我一个人怕不怕,当时我坚定地回答:不怕,你们放心走吧。其实我独自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藏着,只见两边山崖陡峭,荆棘丛生,我紧张得一夜没敢合眼,思考着,如果万一遇到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气的女战士。天刚亮,沟口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准备好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同时把身子尽量隐蔽好,这一天总算平安度过了。

天黑了,一个砍柴模样的老乡(给我送饭的乡亲)向我的隐蔽处走过来,慢慢解开身上的围裙,将炒米球(安徽过年的特产)扔下来。我就拿着这些米球充饥。

过了几天的一个夜晚,老乡提着灯笼在沟口轻轻地喊:“不要害怕,我们接你来了。”一见面老乡便说:“这里不安全,我们把你转移到更靠近茂林一点的地方。”随后便将我送到离唐村不远的马路口的老家乡,为了防备万一,要我装哑巴。

隔了一天,敌人又打了回来,老乡四处逃跑。我怕连累老家乡,便独自带着要饭瓢、打狗棍,向茂林走。幸好路上遇到一批民工,便向他们打听去茂林的路怎么走。其中有一个民工(后来知道他姓杜)自我介绍,我们都是送新四军政治部同志刚回来。他沉思了一会又对我说:“你一个人去茂林有困难,跟我们一起去。”我们边走边说,话很投机。我认他为干爹,求他送我到茂林陆会长家。他怕我信不过他,一再对我说,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住过,他和他们很熟悉,他家离茂林很近,劝我先住到他家,尔后再送我到茂林。他说:“你到我家后有人问你,就说是xx中学的学生,因为打仗,想回家过年。”

一到他家,一家人都把我当作自家人看待。没过几天,村里的人也都知道了我的底细,经常给我送新四军的消息,说新四军要回来的。除夕前,大爷便替我打听好陆会长的住址(后来我知道杜大爷本人也是圣火会会员),是以年货进城和陆会长取得联系。

正月初五,杜大爷给我借了一件新娘子衣服回“娘家”。大爷嘱咐我:“茂林镇九步一个岗,如碰到站岗的,千万不要搭腔,一切由我来对付。”我们通过一个岗哨,顺利到达陆会长家。为了感谢护送我的杜大爷,我将我参军时唯一留作纪念的毛衣送给他。可是过了几天,大爷又把毛衣送回来了,并亲切地对我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我们盼望你们早点回来。”我非常感激并永远铭记住了老乡们对新四军的这份深情厚意。

六

到达陆会长家后,吴寿祺和吴保尊两位老师及时来看我。他们商量后,决定把我安置在陆会长家,并告诉我:“你叔叔(指老夏)和我们已联系过了。”陆家共七口人,陆会长很慈祥,不爱说话,吃饭时非常客气,老对我说:“吃吧,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和你叔叔见过面,他把你送到我家是对我的信任。我们对爱国志士是支持的,没有前线哪有后方的安全。”

我到他家后,茂林的风声非常紧,顽军推行“五家连环保”,经常查户口,只要发现有一点嫌疑,就会被扣上窝匪的罪名,全家都遭殃。还有严密的组织特务网,宣布叛徒来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并贴出布告宣布蒋介石手令,捉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各赏五万元。为了安全起见,陆会长家把我搬到阁楼去。矮小的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只限在一把藤椅的范围活动。阁楼的对面就是当时关押新四军的一座小学。这一家人为了我的安全要担多大的风险呀,但全家人千方百计掩护我,没有走漏一点风声。杜大爷和陆会长全家及吴老师家,和我素不相识,都做到了舍命救人,这充分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

我在陆会长家受到热情的照顾,可我内心非常着急,盼望着送老夏的那位同志早日回来,我能尽快归队。过了40天,我等不及了,和他们商量,先到部队去找我的哥哥周振,再设法回部队。经他们同意,正巧陆会长的朋友周

璞堂是做珠宝生意的客商,要到浙江绍兴一趟,到永康是顺路,于是就把护送我的事托付给他。两位吴老师高兴地通知我说,周老先生原籍浙江,又和我是同姓同乡,机会难得。我喜出望外。起程前,陆会长全家为我送行。他们在这40天里冒着风险,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一生都要感恩图报。后来听说,陆会长于1947年9月为配合我军解放茂林英勇献身。陆老先生是位爱国爱民的英雄,一身正气,令人敬佩!我一直用他们的精神鼓励自己。

七

在周璞堂老先生带领下,我总算离开了茂林的危险境界。到了诸暨,周老先生为我买好去永康的车票,我们就告别了。我到了永康,先找到地下党联络处的俞振熙,这是我嫂子的阿哥家,地址是我嫂子撤退到皖南看我时告诉我的。俞在商办运输公司工作,他们在忙着转移,几座高楼,人走楼空。我就在空楼借宿了一晚,好在白天哥哥来看过我,带我去看过地下党组织住址,我高兴得跳起来,回部队有了希望。

当晚,我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一亮我急忙起来,出城门,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头上转,很快后面跟着九架飞机,六架一组轮流轰炸,足有两个小时,把永康城炸成一片焦土。我随人群流落到乡间山野,等到晚上才去找地下党组织和我接头的同志,随着他们分散到农村居住。不久特委沈景德同志告诉我,交通被日本鬼子轰炸切断了,短期内无法归队,要我暂时留在地方工作。

尽管我总想早日归队,不幸的是我的一条腿突然红肿。农村没处看病,我哥哥用切菜刀替我切开脓肿。可能是感染,我手脚发抖,一条腿不能落地,我担心的是回不了部队。哥哥安慰我:“一只腿一样能为你工作,搞印刷,搞地下联络站,不都同样能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我振作精神,一只脚跳着去赶集。一个土医生发现我一只脚不能落地,问了我的病情,给我放出了脓血,我立时就能脚踏实地走路。党组织介绍我去永康报社配合报社总编辑周健同志,把没有刊登报上的电报译出来,供共产党内部参考。我和周健在报社的公开身份是兄妹关系,在报社党组织掩护下,工作了三个月,后来得知交通恢复了,我便要求回部队。我哥哥把他唯一的一条毛毯卖给了我做路费,还托周健同志为我办理通行证。我终于回到了苏中根据地。

皖南事变血的教训教育了我们。从此我军摆脱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新的新四军诞生了,在发展八万多人的基础上,整编了七个师,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又迅速发展成十八万大军,参加了打败日本鬼子的战斗,后成为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的主力部队之一,我们胜利了!

后记

1939年冬天,周临冰、施奇、汪金球和毛薇卿(又名毛维青)在新四军军部速记班学习结业后,被调到军司令部机要科工作。到军部机要科后,除了学习机要技术外,叶挺军长对她们思想教育抓得特别紧,纪律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更是重视,提出机要员要做到:门紧,手紧,脚紧,嘴紧。对自己的密码本,要比爱护自己的生命更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密码本落入敌手。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30位新四军女兵中,牺牲在集中营的有9人,到1945年只剩下6人。直到日寇投降、集中营被迫解散后才获释放。当年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时,毛薇卿只有18岁,后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施奇和汪金球则分别牺牲于1942年6月8日和6月19日。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老一代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时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始终不能忘记这些新中国的奠基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解奋斗。